

左权文史资料

政协左权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资料室

第六期

1986年4月出版

目 录

太行山：三老在左权县并题词	周建南 (2)
辽县制县会	马海明 (8)
辽县文化教育界救国会	赵相英 (10)
坚持抗战斗顽敌 勇入虎穴捉奸	陈联群 (12)
抗战时期左权县的救国运动	皇甫秉玉 (17)
刘存仁烈士传	曹纪姑 (30)
正气凛然 忠贯日月	
——宋生云先生路	曹纪姑 (34)
附录：补充、订正	
对《辽县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的建立和参战支前	
情况简介(初稿)》的补充订正	靳先为 曹纪姑 (41)
关于伪警备队起义情况的订正	曹纪姑 (44)
关于民歌《王小三诉苦》的一点说明	皇甫秉玉 (46)
《左权文史资料》第五、六期勘误表	(46)



左权文史资料

政协左权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资料室

第六期

1986年4月出版

目

录

太行山：三老在左权县并题词	周建南 (2)
辽县制县会	马海明 (8)
辽县文化教育界救国会	赵相英 (10)
坚持抗战斗顽敌 勇入虎穴捉奸	陈联群 (12)
抗战时期左权县的救国运动	皇甫秉玉 (17)
刘存仁烈士传	曹纪姑 (30)
正气凛然 忠贯日月	
——宋生云先生路	曹纪姑 (34)
附录：补充、订正	
对《辽县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的建立和参战支前	
情况简介(初稿)》的补充订正	靳先为 曹纪姑 (41)
关于伪警备队起义情况的订正	曹纪姑 (44)
关于民歌《王小三诉苦》的一点说明	皇甫秉玉 (46)
《左权文史资料》第五、六期勘误表	(46)



太行二、三专署在左权县合并情况

阎 濂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原来以交通线划分的专署、县、区分割的局面，已不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当年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行行署，决定将原太行二、三专署实行合并。合并前二专署辖太谷、和顺、辽西、昔阳、平遥、寿阳路南、部分榆次等县，日寇投降后已先后恢复原来县属区域，原三专署辖左权、黎城、武乡、榆社、襄垣、祁县部分，驻地在武乡下寨村，专员武光汤，我任专署秘书长。一九四五年冬初进行合并，将原三专署黎城、襄垣、武乡（武乡先划归二专，后划归三专）划归三专署；左权、榆社、祁县划归二专署。初冬，原三专署部分干部前往左权和二专署正式合并。合并后二专署专员杜润生、副专员范新三、我任秘书长。

二、三专署合并工作和干部配备顺利完成后，立即抓了两件事：一是募集救济物资，赈济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群众生活、生产极度困难地区。当时可说是一方呼吁，八方支援，“救灾如救火”，很快募集到大量旧衣土布等过冬物资，集中在涉县温村，武安阳邑，左权桐峪、石匣村，随即转运到晋中最困难地区，发放到群众手中。这对安定群众生活恢复生产有一定作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左权县原辽西也有战争破坏严重地区，但地方干部和群众，本着困难弟兄一家人，晋中灾区比我们还困难，他们不但没伸手，而且还积极帮助将集中在石匣的物资很快转运到晋中，路上没有遗失现象。这充分表现了地方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和风度。

二是，在左权县石匣村召开了新建制二专署第一次县长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抗战时期不定期、不定址打游击开会。会上讨论了在老区主要抓生产建设；在新解放区结合安排生活、生产，继续发动群众除奸反霸运动，为土改作准备。会上总结工作经验，印发了各县一些材料，印发了左权县贯彻执行财粮制度和教育宣传工作经验总结。会议结束后，各县县长回去时，有的顺路短暂访问了左权县各村生产互助、文教宣传、财粮清理等工作情况。

当时二地委驻马厰村，左权县开大会和重点工作会议，地委专署都派人参加协助。那时左权县委书记翟英，县长杨尚宇，对地委和专署安排的工作都是密切配合，贯彻执行，可说是专署和县之间很协调。特别是石匣附近各村干部和群众遇有疑难事情，经常到专署访问。专署各科研究什么工作，常就近到左权县各村调查研究访问群众，专署与群众是有密切联系的。

一九四六年五月，专员杜润生同志和我一同调太行行署工作，二专署工作由樊雨生同志主持。

辽县牺盟会

(初稿)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节节进逼，企图把山西作为他们的侵略重点，在山西设立特务机关，疯狂地推行他们的侵华政策和战争部署，妄图吞并全中国。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之后，为了团结抗日，党中央提出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主动撤回陕北。山西全省工农大众，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迫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阎锡山政权内部的一些进步人士也积极组织进步力量，要求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在这种政治形势的推动下，阎锡山为了巩固他在山西的统治，被迫同意了共产党的主张和进步人士的要求，山西牺盟会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应运而生。

一九三六年十月，薄一波同志带领一批经中共中央批准获释出狱的同志，奉党的指示回到山西，开展抗日救国运动，高高地举起了牺盟会这面统一战线的合法旗帜，以牺盟会的名义，在山西开展了全面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

一九三六年冬，山西牺盟总会在太原先后举办了两翼村政协助理员训练班，训练班结业后，共产党员史怀璧同志受牺盟总会委派到辽县担任联络员。同时，派宁荣成、李沛

堂、李旭、暴元庆等八九位同志为辽县村镇协助力，共同开辟辽县牺盟会工作。史怀璧同志为主要领导人。他除全面负责联络工作外，还兼管城关区的牺盟工作，至此，辽县牺盟会组织正式建立。

史怀璧等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在辽县工作了近两个半月时间，他们利用宣传品、漫画和宣传牺盟会宣言、章程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日寇侵华，抗日救国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政策等。他们的工作重点对象首先是小学教员等知识界。当时，县城内的一高小和育贤小学是牺盟会工作的重点单位，其次是分散在乡村的小学，高小和在太原读书返乡的中学生。同时，对农民也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为了使宣传发动工作更有实效，他们还组织了活剧等宣传形式，在街头演出进步剧目，唤起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与此同时，史怀璧同志和担任村镇协助力的宁荣成诸同志，在各乡村大力发展牺盟会，县牺盟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全县牺盟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五百余人，基本上普及到了各个区乡。

当时的辽县县政府仍属阎锡山的反蒋政权，他们认为凡是宣传抗日的都是共产党。一天早晨，在县政府升旗仪式上，史怀璧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何梅协定”是卖国协定，号召大家团结抗日。为这一句话，旧县政府向阎锡山告状，说史怀璧在为共产党宣传，妄图赶走史怀璧等同志，阻挠辽县牺盟会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九三七年二月，史怀璧同志调离辽县，宁荣成、李沛堂、暴元庆、李旭等村镇协助力亦相继离开。史怀璧调离前，为使全县牺盟会工作不致中断，在省牺盟总会未另派特派员之前，指定第一高校校长冯瑞如和育贤小学教员王善玲为辽县牺盟会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冯、王均系辽县最早参加牺盟会并积极进行工作的进步人士。当时担任辽县一区（城关区）区长武光汤同志对牺盟会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旬，史怀璧在太原向山西牺盟总会汇报了辽县牺盟会两个多月的工作及组织发展状况，并将辽县牺盟会临时小组成员向牺盟总会作了汇报，得到了总会的同意和支持。

嗣后，史怀璧同志按照总会的指示，将辽县牺盟会的积极分子和临时领导人冯瑞如、王善玲同志的情况向当时山西工委书记李宝森和姚协民同志作了介绍。大约在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李宝森以牺盟总会视察员身份来到辽县。他首先找到冯瑞如和王善玲同志，了解并指导了辽县牺盟会的工作，还支持帮助在县城召开了妇女大会，成立了

辽县妇女救国会，由王善玲同志任主任委员，对发动妇女群众抗日救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史怀璧调离到同年七月，总会正式委派姚协民担任辽县牺盟特派员，这五个月期间，冯端如、王善玲同志领导了全县的牺盟会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牺盟总会调雁北十三县的特派员回太原，根据新的形势，重新布置了牺盟会的工作，决定成立辽县牺盟中心区，指派侯振亚、史怀璧、刘广德、张天乙、徐兴文等同志到辽县担任牺盟中心区领导工作，侯振亚和史怀璧同志为主要负责人。辽县牺盟中心区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九月间，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合并于沁县牺盟会中心区。侯振亚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调沁县牺盟中心区工作，张天乙同志也派往武乡县任牺盟特派员。侯调离辽县后，辽县牺盟中心区的工作由史怀璧、刘广德、徐兴文、王乃党同志负责，史怀璧同志为主要领导人。这时，中心区派张忠厚同志任辽县牺盟会特派员。

(二)

一九三七年九月初，党的特派代表徐子荣同志，同侯振亚、史怀璧、张天乙、徐兴文等同志从太原步行到达辽县，住县城贫民学校，随即召开了辽县牺盟中心区负责人会议。会上徐子荣同志代表党的特委指示：“在牺盟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兼任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从此，牺盟会的工作重心，由过去一般地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到创建共产党的组织方面来。同年十月，冀豫晋省委成立。十一月份，省委同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一起进驻辽县西河头村。根据李雪峰、陈晋玉的指示，为了发展党组织，决定成立中共辽县县委，由侯振亚同志担任县委书记，史怀璧担任组织部长。同年十一月，侯振亚同志调沁县牺盟中心区工作后，由史怀璧同志担任辽县县委书记。“七七事变”前，辽县系空白县，没有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从一九三七年冬开始，史怀璧和陈舜英同志仍以牺盟会领导人的公开身份，共同着手在辽县创建党组织的工作。这年十一月初，经他们介绍，分别将当时的县立高校校长冯端如，教员杨尚宇，育贤小学教员王善玲和城关区区长武光汤同志吸收为中共正式党员。这是辽县党组织创建初期入党最早的第一批党员。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辽县县委根据冀豫晋省委李雪峰同志“发展党员要超出个别发展的范围，要大批发展”的指示，举办了辽县牺盟会学习班。吸收中学生，小学教员和一些贫苦的农民参加，共一百余人，史怀璧和陈舜英同志具体主持了这个学习班，给学

员们讲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在学员中物色积极分子，并对他们另行编班，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共产主义基础知识的教育。经过审查，发展了第二批新党员，共约十多人，差不多每个区均发展了一两名共产党员。现任国家机关党委常务书记的王锐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史怀璧和陈舜英同志是他们的入党介绍人。之后，依靠他们在各区建立了党小组或支部，使辽县的建党工作由县城深入到了农村，为后来全县党组织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一九三九年五月，沁县牺盟中心区调黎颖同志来辽县，接替张忠厚同志的辽县牺盟特派员工作。当时担任辽县牺盟会特派员的还有降贵同志。黎来后不久降即调离辽县。当时牺盟会只有晚上才回城里活动，白天就在城南庄则村办公。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寇占领县城，牺盟会转移到东隘口村，以后又迁至西黄漳村。

县牺盟会组织机构和干部配置：

秘 书：刘九祥

组织部长：郝宗琪

宣传部长：赵德明

副 部 长：王东耀

机关工作：霍发祥

农会秘书：左奎元、韩光煌、杨成江

工 会 秘 书：巨茂德

妇教会秘书：孙 婉

青教会秘书：赵德新

各区牺盟干部配置是：

一区秘书：

二区秘书：

三区秘书：侯德荣

四区秘书：王永德

五区秘书：药维忠（辽西）

六区秘书：申步超（辽西）

七区秘书：江祯祥

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间，日寇向晋东南地区大举进攻，并侵占了白晋线，把晋东南从南到北分隔为路东、路西两个部分。当时驻沁县的各救总会领导机关，辗转到了辽县的东隘口村，至此各救总会即迁驻于辽县、黎城、涉县一带。

随着形势的发展，领导机关驻地转移频繁，辽县牺盟会在桐峪、羊则驻了一小段时间后，又迁驻于西黄漳村，嗣后又迁到东黄漳村。

牺盟会驻东黄漳期间，可谓多事之秋，问题接踵而来，特别是“秋村会议”之后，阎锡山为了配合蒋介石的反共步伐和维护其顽固势力的需要，首先对牺盟会，决死队下手，不择手段地迫害山西的进步力量，最后，酿成了作为蒋介石反共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二月政变”。

牺盟会在党的领导下，一贯主张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以斗争求团结。根据山西的特殊情况，发展了统一战线，壮大了进步力量，发动千百万群众参加了抗日斗争，同阎锡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牺盟会遵照党中央的斗争策略和原则：反对不必要的磨擦，进行必要的磨擦；有理，有利，有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从思想政治等方面准备给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以迎头痛击。

一九三九年夏，阎锡山把牺盟会的经费全部停发，牺盟会的办公费和干部供给都没有了，牺盟会的同志们只好吃发了霉的、生了虫的谷米，吃的菜是水煮胡萝卜干，黎英同志当时怀孕在身，闻到这样的饭菜味就恶心。其它人到食堂吃饭她却跑到山坡上找些酸枣吃。因为很少吃到粮食，她的身体瘦得不成样子。

十一月，天渐渐地冷了，本地干部都捐来了棉衣，而黎英同志还是身穿夹衣，晚上盖条被单，欧阳景荣和徐子荣同志知道后，才设法为黎英同志解决了棉衣和棉被。

黎英来辽县任牺盟会特派员时，辽县取消公道团的斗争已经开始。当时，公道团长是李树茂、副团长乔信、文书郝乃文。牺盟会虽成立，但李树茂的活动并未停止。从县城撤退后，为了拆散他们的力量，中心区把乔信调走（过漳河时淹死）。不久，李树茂也跑了，郝乃文被留在县牺盟会协助霍发祥工作。从此，黎英同志兼任了公道团团长的

职务。这样辽县公道团各存实亡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辽县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村召开。会期三天，代表八十余人。大会进行了形势分析，牺盟问题报告，工作总结等议程，并通过大会宣言及重要提案三十余件。其中主要有：（一）要求阎司令长官揭破顽固分子妥协投降阴谋，撤换顽固分子之先进分子以利抗战；（二）要求阎司令长官通缉蔡逆维飞执行枪决，没收其财产；（三）要求总会转请中央批准牺盟会决死队选举代表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四）要求早日完成各级国民参政会；（五）呈请阎司令长官恢复决死队政委制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起至十二月初，晋东南地区牺盟会在沁源县霍村召开了第二次牺代会。辽县牺盟特派员黎颖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薄一波同志作了重要讲话，针对阎锡山将要发动反共高潮，号召代表们“也要准备两个”。并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为制止反共高潮，做好一切准备。

十二月初，会议仍在进行，“十二月政变”爆发。会议决定一部分县的牺盟会特派员立即回去领导斗争。这次牺盟会会期虽短，但大家做了足够的思想准备，满怀高昂的战斗激情，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投入到严酷的阶级斗争中去了。

接着，阎锡山为了达到其消灭山西进步力量的目的，连续派出精神建设委员会（简称精建会），敌工团和所谓的军政民视察团，专事破坏在敌后坚持抗日的牺盟会和决死队工作。

“精建会”人员是阎锡山从秋林派来的，根据牺盟总会通知：各县牺盟会特派员和县长都兼任“精建会”特派员。在精建会未来之前，辽县牺盟会党的特别小组进行了专门研究。“精建会”到来之后，特别小组发动群众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为了限制“精建会”的活动，首先把“精建会”特派员景宏猷安排在西黄漳住，派牺盟协助理巨玉秀同志去管“精建会”的机关工作。景宏猷提出要发展会员，各区建立“精建”分会，黎颖等同志立即提出，由各区牺盟会兼起各区“精建”分会的工作。区牺盟会的秘书兼任“精建会”的秘书，牺盟会的会员都可以参加“精建会”。这样牺盟会就把“精建会”的组织包了下来，实际上包而不办，各区连“精建会”的牌子也没挂。

景宏猷对建立“精建会”的工作放心不下，想下去看看各区对“精建会”的落实情况

况，但他一人又不敢下去，要黎颖同志与他同去，黎颖同志为阻止景宏猷下去，以“没有时间”为由，推脱了景的要求。

为了应付“精建会”，辽县牺盟会“发展”了一批“精建”会员。经研究，从牺盟会协助力及县政府科长中选择了二三十人，由巨玉秀登记了一个名单交去，算是“精建会”的第一批会员，以后再没有“发展”。这些会员当中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是“精建”会员。

黎颖同志在“精建会”兼职兼薪，她把在“精建会”领的每月四十多元薪金作为牺盟会的经费，巨玉秀同志领的“精建会”经费也交给霍发祥入了牺盟会的账。

这时，阎锡山从秋林又派来了军政民视察团王陆轩、段立红等人。之后不久，阎又派来一个所谓的敌区工作组（简称敌工团），团长姓高。他们来后不到敌区去工作，却打着阎锡山的牌子，说坏话，办坏事，专事捣乱破坏。紧接着，阎锡山的军政干校招生处亦来到西盩村，企图招募一些青年。形势越来越紧张，县牺盟会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开始由县农会主席左奎元同志发动和带领农民群众向敌工团长请愿，抬着一顶花轿，要求其到敌占区工作，救民于水火之中，吓得敌工团长高某从西黄漳跑到东黄漳向黎颖同志求救。黎颖同志对他说：“你为什么害怕呢？这是群众‘拥护’阎司令长官派来的敌工团嘛！敌工团也应当到敌占区去解民倒悬。这是群众的要求，也是你们的责任。”群众聚集在黄漳河滩上，左奎元同志带着几个代表来“请”他。黎颖同志也动员他不要辜负了群众的期望。这个敌工团长只好战战兢兢地上了左奎元同志为他准备的“轿子”。群众把他抬至半路，就用石头送他“回老家去了”。“敌工团”就这样被解决了。

解决了敌工团，紧接着就解决“精建会”、军政民视察团等反动组织。这也都是左奎元同志带头搞的。群众包围了他们的住处，抓住了视察团的王陆轩，召开群众大会执行了枪决。“精建会”的景宏猷和视察团段立红潜逃。景宏猷逃至苇则一带即被群众抓住打死，只有段立红一人只身逃去。至此，阎锡山派到辽县的反动组织视察团、“精建会”也被彻底摧毁了。与此同时，牺盟会派人到拐儿镇收拾国民党县党部，而县党部书记刘之礼早已逃之夭夭，县党部亦不复存在了，“军政干校招生处”亦被取消。

一九四〇年初，牺盟会决定取消特派员制度。二月初，黎颖同志调中心区路东办事

处。撤离后，由刘九祥同志负责辽县牺盟会工作。

是年冬，辽县牺盟会组织随着太北区各级牺盟会组织的消亡而消亡了。

牺盟会是山西地方性的群众抗日团体，其中有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该团体和共产党密切合作，在抗日战争初期在山西曾起了重大的作用。

辽县牺盟会是山西牺盟总会派来辽县的抗日群众团体，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人。他们为党组织在辽县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抗战初期，他们与辽县各级党组织、抗日政府和八路军密切配合，在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开展反对阎锡山派来的各种反动组织的斗争，为辽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左权县史志办马海明整理）

1985年5月8日

辽县文化教育界救国会

赵相英

一九三九年春，在中共北方局文委李伯钊直接领导下，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救国总会在沁县成立，辽县出席代表三人：赵相英、宋耕如和郭甸。在这次会议上赵相英当选为执行委员。常委为高沐鸿、王振华、张伯园、王玉堂和黑丁。总会决定设立两个文总办事处。第一办事处设在长治，由崔斗辰负责；第二办事处设在辽县，由赵相英负责。

会后，赵相英等三人迅速返县，筹备成立辽县文化教育界救国会，在庄则村庙上召开了文教会，出席会议的有：县政府、教联会、牺盟会、民族革命学校、编村中心学校主任、话剧团、小学教师、在乡知识分子、民间艺人、开明士绅和学者名流程鲁臣、皇

甫凤翔等代表二百三十一人。大会由杨尚宇、宋耕如、李祥林、赵相英和阎鲁斋主持。

宋耕如在大会上传达了总会精神——团结全县文化教育界人士，组成文化革命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抗日救国，对敌开展宣传战。

赵相英在大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对敌开展宣传战”的专题报告。

大会一致通过了“辽县文化教育界救国会章程”，专题报告和后选人名单，并以无记名投票选出了赵相英、宋耕如、李祥林、阎鲁斋和程鲁臣为常务委员。

县政府、文教会曾联合召开过知名流士绅会。县长欧阳崇荣主持会议，赵相英在会上作“人格救国”的发言，还印发过“人格救国”的小册子，号召大家发扬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和夏明翰等民族英雄的尚气节，唾弃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和王揖唐等无耻之徒民族败类，作到高风亮节，为国家为民族发光发热。

会后王衷惠先生曾任辽县救济委员会副主任，王仲蔚先生任辽县副参议长，郝海如先生任县政府秘书，孙华先生任辽西参议员，程鲁臣先生任抗战学院图书馆长，连世荣先生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刘蔚翔、宋生云、郝骥等先生都在县城沦陷后，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文教会充当了“抗战报社”的编印人员，社址设在赵坪村，阎廉甫任编辑。

文教会承办了编写小学教材工作，聘请高克东为编辑。

文教会对辽县旧民歌进行改革，去其糟粕（如《刮大风》、《隔天红》、《大娘呀》、《攥学村》……）采用其中的一些曲调，旧瓶装新酒，代之以新颖的、民族的、战斗的革命内容。如《拥护八路军》、《新四军》、《慰问伤病员》、《开荒》、《新政权》、《石阿有个狼牙山》、《民革室》、《滚蛋鬼》、《贵崖洞大胜利》、《左权将军》等人民喜闻乐唱的歌曲。丁毅（莫斯科中山大学教授）所编写的《中国革命文学史》巨著中，曾赞扬“陕北民歌”和“太行山民歌”为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文学。

一九三九年秋，我从文教总会及“西康秘书处”获悉，晋东南来了个国民党督察专员武誓彭，委任刘子礼为辽县国民党书记长，发展伪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在中共县委领导下与县政府配合，对他们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倒行逆施的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此刘子礼等一小撮国民党反动派就从拐儿镇逃之夭夭了。

与此同时，从晋西来了第二战区“精神建设委员会”一哨人马，一屁股蹲在了革命

根据地，以咬耳朵的方式，向青年人们进行宣传活动：“要做官，到晋西，生活好，多自由，娶个好姑娘，荣华富贵过一辈。”我们很快就查明了“精建会”原系蒋介石毒害青年的反动组织，传到山西时，阎锡山就把它和“敌工团”组成一对姊妹组织。文教会假寺坪二民校召开了全体会员大会，向顽固分子“敌工团”的高团长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以大量确凿事实，予以有力的回击。

抗战胜利，辽县文教会完成了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自行消亡。

1985年6月2日

坚持抗战斗顽敌 勇入虎穴捉汉奸

赵效晋口述 陈联祥整理

我叫赵效晋，是左权县石匣乡小岭底村人，现已年逾古稀。在抗日战争年代，英勇善战的小岭底人民，顽强战斗深入敌人心脏捉拿汉奸，铲除敌伪走狗，为民除害的一些情况，至今记忆犹新，现将这段史实简述如下：

开 展 斗 争

小岭底村位于辽县城西三十里的地方，是通往榆社县城的咽喉要道，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小岭底人民和日本鬼子开展了顽强不屈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后有五十七名优秀青年参军、参战、外出当干部打日本。在家的青年和壮老年也在党的领导下，和敌人展开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从敌人入侵榆辽公路占领榆社县城，到日寇投降五年内，每年给我抗日政府和军队送军粮四十余石，妇女们给八路军和子弟兵

做军鞋、军袜一百七十余双。在敌人严密的封锁控制下，还担负着护送过路军政人员，接送伤病员，传递转送情报，开展抗抓丁拉夫，抗拒交粮款、抗交差役物资、抗选送妇女上炮台等任务。还自组游击小组配合八路军、基干、轮防、保家队深入县城等重要据点袭扰敌人，破坏敌人道路、桥梁、砍电杆、割电线、保护群众转移，空室清野，保卫生产。

一九四〇年五月，日寇侵占榆社后，对榆辽公路沿线严加控制封锁，在小岭底村北岭山上修了个炮台，对小岭底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每天早晨太阳出不准起床，晚上不准出门，不准点灯，违者按“通匪”论处，满门杀害。鬼子、汉奸不顾人民春耕之忙，强迫全体村民去给他们修炮台、修道路、担水送东西。他们每天四出搜山捕人抓夫，搜寻妇女奸淫、烧杀、抢东西、无恶不做。害得穷苦百姓朝不保夕，被迫离乡背井，宿居山梁沟洼逃难在外。后来鬼子又变换手法，利用其敌伪人员组织宣传搞“维持”。当时在敌强我弱，长期在外无法生活的情况下，经我方区委批准，全体村民便推选出身为人民办事的张三元、张林角，冒着生命危险，回村上炮台和日本鬼子搞联络讲“维持”。全村人民返村后，在日寇铁蹄蹂躏下修炮台，当民夫，往山上抬水，修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领导全村人民斗争的地下组织，以张凤牛、张凤岗、赵福林，张文书等同志为首，积极组建党的支部，发展党的组织，先后有二十多人入了党。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党员各自联系群众，开展了对敌斗争。白天派人搞联络欺哄敌人，晚上组织群众配合八路军破路、刨电杆、割电线，袭扰敌人。同时组织群众给我军送军粮送军鞋、军袜，送慰问袋、送情报等。如妇女张三女、曹美英等同志，在敌人严加封锁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以割菜、走亲戚为名，亲往白城、大林、连庄、红都等地区区政府转送情报、信件等。张双喜，张银春居住在炮台根，经常在家掩护八路军侦察人员和干部。就连哑叭张四孩也担任警戒。有一次抗日干部正在张凤章家开会，布置抗粮斗争时，敌人从炮台下山到村，张四孩赶忙跑回，用手比划着“注意小胡子来了”，从而保证了区村干部安全转移。全村人民就是这样在敌人的眼皮下哄鬼度日，在斗争中求生存。

鬼子暴行

一九四〇年六月间，敌人以小岭底“良民通匪”为名，勾结辽城之敌伪军宪人员来了个大搜查、大逮捕，把赵福林（党员）、张文书（党员）、张富生、张德成等十人逮捕，中途除张德成等四人逃跑外，其余被捕到城内的六人被杀者四人。

同年九月，我军打响了百团大战第二战役，收复了榆辽公路，小岭底全体人民全力以赴支援我军，一夜打下小岭底炮台，为人民拔掉安在自己头上的一个“钉子”。全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庆祝胜利，家家户户筹集粮食、蔬菜、鸡蛋慰劳军队，支援收复管头，石匣炮台之战。不料于十月五日敌人在百团大战将尽尾声之际，从管头返辽之敌，将村包围，四出搜山抓人，野蛮血洗小岭底为被我军民打死的日本鬼报仇。仅这次事件就把二十九名无辜的百姓抓到村前河滩，用机枪点名扫射而惨遭屠杀。有三户被杀绝，其中赵三孩、赵四孩全家九口全被惨杀。全村除给留下六眼石窑和西眼土窑外，七百多间房全被烧毁，抢走大牲口二百七十多头，羊四百余只，其它财产全被烧毁洗劫一空，这就是小岭底惨案。

一九四一年三月，日寇第二次侵占榆辽公路沿线各村，在红都村修筑炮台。因小岭底被我辽西办事处命名为抗日模范村，实验重点村，更加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扬言要洗劫小岭底，所以对小岭底严加控制。在这一年，抗日干部张凤林被捕，村党支部组织群众开展营救张凤林的斗争。赵贵保、张双喜等七人舍身住木笼保释张凤林出狱。同年八月，得知村里情报说，张凤林将在中秋节由伪村长张振联保送回村过中秋节，我三区轮防队在区委带领下，将张凤林营救出来，将汉奸张振联逮捕镇压。

敌人在同年十二月进行年关大扫荡时，由大汉奸李金才带领敌人拂晓包围小岭底村，抢粮三十余石，谷草二万余斤，杀害我抗日干部和轮防队员九人，其中有轮防队长荣五德等五同志，在与敌人搏斗，组织群众转移时不幸牺牲，张银江等四同志被敌寇捉回县城杀害。还有张联孩、张三小兄弟二人因打死敌人洋狗而惨遭杀害。总之，从四〇年到四四年的五年期间，小岭底人民勇于和敌人斗争，先后牺牲于敌寇屠刀下者达五十多人。张招林父子五人因与敌人英勇斗争而光荣牺牲，全村人民誉之为“英雄父子，光荣之家”。

智擒汉奸

一九四一年春，红都炮台的日寇，疯狂地四出扫荡，到处抢劫抓去，强迫周围村庄建立维持会。我抗日军民在地方党的领导下，和敌人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月二十八日，红都炮台上的鬼子，在汉奸带领下出发小岭底，有目的、有预谋地捉走我抗日干部家属十人，其中有赵恒庆夫妇及其次子共三人，还有抗日干部家属赵福祥、张小三、赵林芝等。并到船上抓走在我军分区任武装部长的李贵成的母亲及其二哥，他们被抓到红都炮台捆绑在铁网上。受审中无一人承认我抗日军民住地和干部姓名，无一人承认自己的子弟给共产党工作，尤其是赵三女志大娘，在敌审讯中一口否认自己的儿子跟随八路军，受尽敌人折磨而坚贞不屈。

事件发生后，人们都疑惑不解，感到事情发生的突然奇怪：为什么红都炮台的鬼子对我村的抗日干部知道得如此清楚呢？为什么鬼子派人一家包走不送呢？就是赵恒庆、赵林芝在地头劳动他们也知重呢？众口都说：“其中必有内奸！”“内奸是谁呢？咱村里人都在家，或者是邻村上下的人呢？总是你情人。”就此问题，三区政委马志彪、区长白锋在雷家沟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对敌斗争除奸计划，并向政府作了汇报。县长张广居听取汇报后提出：“要东吴吴事，还须东吴人。赵效晋是负责组织红都炮台周围对敌斗争的具体工作的，他又是小岭底村的人，必须由他亲自负责偵查拿下这个任务。”县委书记张庆庆，公安局长马佩珍严肃地对我说：“要想在炮台周围打开局面，开展工作，稳住形势，站稳脚跟，首先得挖掉脓疮，除掉祸根。”祸根到底是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到底是谁在炮台上当汉奸作恶，或者谁和炮台上鬼子联系抓咱们的人，这还是个谜，还得下大功夫，花大力气，甚至做出必要的牺牲，弄他个水落石出。我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掩护支持下，七进红都，四上炮台伙房，五访被害家属，四遍偷进课堂一带查访红都炮台敌人扫荡的引路人和周围联络员接触汉奸的情况。从而了解到张富生因在桐塔八路军军中贪污受处分而对党不满，跑回城内投敌叛变当了汉奸。为了取得鬼子的信任，他到红都炮台为敌效劳，苦害百姓。

张富生当了汉奸，死心踏地，为敌人立功的第一手，就是亲自出马，为敌人充当向导，假装太君骑在马上亲自指挥。正如狮岩村郝育贤作证说：“那天我去小岭底合作社时、在铺上桥头处亲眼看见那个骑马的日本太君，很象你村的张富生。”为了进一步落

实这个问题，解除我的疑团，又走访了连庄村联络员候德成（富生姐夫）和他姐姐张焕籽，证实了这一事实。又从孔家庄抢粮，抓妇女和在柳林逼婚招亲，并决定在端阳节举行结婚的事实中，进一步证实了小岭底事件是张富生亲手策划而造成的。就这样用了一年多时间的侦查，第七次向辽西县委作了汇报，县委亲自给我布置和安排了活捉张富生，为辽西人民除害的光荣任务。

一九四二年五月端午是个除汉奸的好机会，这天一清早我就回到我村北岭山头，俯瞰村景，洞察张富生完婚之憎。有从炮台上来的，有从城里来的鬼子和警宪汉奸，有从各联社来祝贺的村干部和联络员，有的是亲戚朋友，真是王八乌龟大会聚，热闹非凡。杀鸡宰羊害怕，盼的是平安无事。直到太阳西下时，鬼子汉奸三五成群地离去后，我穿戴下由回去执行任务。按照上级指示，先布赵来福、赵玉林（两个党员）取得了联系，交代了任务，回家安慰了父母，让我林去给张富生送了五元礼钱（鬼票，由公费付）。果然，不一会张富生亲来我家，双方一客套话其叙旧情后，各自提出互保安全，互不侵犯。稳住敌人以后，晚上我亲临祝贺新喜。酒宴之后，我告诉他：今晚我亲自来给贺喜，还带着往外送粮，取军鞋的任务，并让他看了政府通知，不但不能自后干涉，还得保证今晚完成任务。他表示同意，愿立功赎罪，我点头表示满意。

我倒烧土沟给赵来福、玉林两同志下达了任务后，二次又到张富生家轻声敲门，叫醒张富生，以不经张富生当面点头不致往外送粮和军鞋为借口，要求他必须帮助完成这一任务。他在无奈之下只好跟我一同到了烧土沟。他正要和来福、玉林二人说话时，我便取出手枪敲手打了他两个耳光，宣布说：“今天我是奉政府的命令来带你的，识时务者跟我走，争取一条活命，不识时务的话就地处决。”说着给他带了手铐，麻绳捆绑，交给来福、玉林二人看管。我又把汉奸王柱世和彭贵镇捉来，押送到界岭村，交给布置好的轮防队员看守。次日便把他们送往辽西县政府收审。四二年秋，在专署和辽西县政府的合作下，结合反维持、反粮食斗争，在庙上河滩召开了公审大会，处决了张富生和王柱世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汉奸，为辽西人民除了祸害。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八日